

○中國政治文化叢書

無所不在的偉力

——地理環境與中國政治

● 吳松弟 / 著

鐵犁與馬鞭：六大區域社會 民族戰爭分析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地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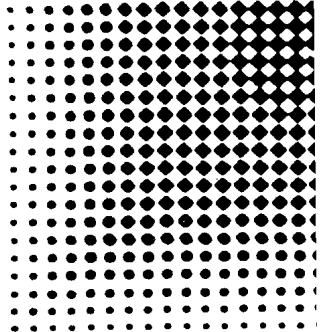
皇帝與土皇帝：古代中國統一與分裂的地理基礎

歷史上的南北對立

大中心與小中心：古代都城的一般概況

中國封建社會統一王朝都城的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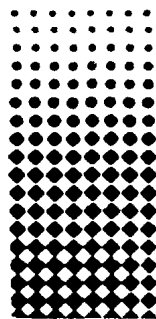


無所不在的偉力

——
地理環境與中國政治

● 吳松弟 / 著

吉 林 教 育 出 版 社



中国政治文化丛书

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

吴松弟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4插页 141 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印数：1—3 000册 定价：3.10元

ISBN 7-5383-0698-6/G·657

总 序

汤 一 介

近年来的文化讨论，已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关于文化的浮泛议论，已为具体考察文化史及其相关的方面所取代。虽然，目前的文化理论仍很薄弱，但这种转向表明：关心文化的人们意欲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从而建构一个更切实际的理论来。《中国政治文化丛书》的出现，可以说为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开拓了又一个广阔的领域和视野。大凡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强烈感受，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大。因此我想，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深入探讨，将会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本世纪50年代，国外的社会学工作者，提出了“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这一概念，用于分析社会政治。其大致的想法是分析人们对政治行动的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等取向。通过把政治系统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进而揭示政治领域的结构和意义、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政治文化系统的特性。这些对我们来分析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般说来，政治与文化同属于“上层建筑”，各自都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政治往往居于核心。思想和文化都或强或弱地受到政治的控制和约束。政治是使用权力的事业，是各种利害的冲突场。它具有难以自制的扩张性或普遍化倾向。换言之，在政治与文化之间，政治具有取消文化独立性的倾向。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化，从消极的方

面说，尽量削弱政治的压力，以维护自身的特殊性；积极的方面，则反过来影响政治，以达成与政治的一种正常关系。此外，还有一个最坏的可能，就是屈从于政治的压力，满足政治扩张的需要，从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全然作为一种政治化了的工具。这些情形，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并有着十分不同的结果，后者往往出现强权专制、僵化单一的结局，前者则常常伴随着开放或民主、活力或创造的生动局面。当然，政治与文化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是如何进行的，这就需做许多具体细致的分析工作。我想，《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在这些方面应有所作为。

曾对中国政治思想作过系统考察的萧公权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说：“中国之政治思想者，中国文化与社会之产物，而同时为二者不可割离之部分。吾人欲彻底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自不得不研究中国之政治思想。”十分正确。这里，我想从另一个方面即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所谓“内圣外王”的说法，许多大思想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或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我想这是对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实是中国的一套政治哲学，而哲学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如何认识“内圣外王之道”就成为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课题。“内圣外王之道”，最初见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为“治世”。从儒家的传统看，更是据“圣人最宜于”为“帝王”提出来的。《墨子·公孟篇》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为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

子哉！”这段话包含着两个重要观点：（1）“圣人”应该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的人，即是说他是道德学问最高的人。（2）“圣人”或许是最宜作帝王的人。至战国末期，荀子的弟子歌颂他的老师说：荀子“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德主明，循道正行，是以为纲纪，呜呼，贤哉！宜为帝王。”“内圣外王”成了历代儒家“治世”的一贯主张。但它实际上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即儒家的“境界观”，主要指圣人的道德和学问的修养。另一则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事功的向往。这是应当分别的。在传统儒家看来，“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内圣外王之道”的。换句话说，实现其“理想人格”（内圣），从而就可以实现其“理想社会”（外王）。事实上，“圣人”是否最宜作王，是很可怀疑的。即使圣人做了帝王，社会政治又能否按照他们的“理想”得到改造，我认为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照我看，“内圣”和“外王”，作为两种对人的品格要求，应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内圣”是关于个人道德和学问的修养，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品格，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内圣只是从个人方面说，如果努力追求是可以达到的，至少在精神上可以达到。“外王”是现实社会的统治者，它的问题则是要“面对现实”，他的理想只能是“面对现实”，而去做时代所允许的事功。如果要求“外王”做“圣王”，推行“内圣外王”之道，那势必要在社会中造出许多假象，以至画虎不成反为犬了。从中国历史上看，除了儒家所编造和美化的上古尧舜之治外，可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圣王”，而出现的大都是有了“帝王之位”或者企图“帝王之位”的“王圣”。这些“王圣”，一方面是他们自居于“圣王”，而另一方面是由某些“思想家”们捧为“圣王”的。这中间最大的危险是把

“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从而，一方面美化了现实政治，说政治是符合“道德”的；另一方面，是使“道德”从归于政治，即认为凡是适合政治要求的都是“道德”的。我认为这都是不可取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人治”为特征的社会，而不注重“法治”，从思想方面看，正是受上述“内圣外王之道”理论影响所致。

因此，从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很难开出现代民主政治来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靠一个“圣王”来实现的。“民主政治”首先应是由广大人民作主，其次得建立一套保障人民权力的制度。但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基于“圣人最宜于做王”观念而有的，而“圣人最宜于做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观点，这和民主政治是相违背的。但是，我无意于全面否定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就其强调道德和学问的修养，理想人格的追求，及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如对之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也许可以在推进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的增长方面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的前途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里，实行民主政治，确实有许多困难。因此，切实地分析历史与现实，是十分必需的。有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这是不够全面的。现代化也正是有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和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才比较全面。没有政治方面的现代化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现代化最终也可能落空。中国的社会现实，既负有沉重的传统，又面临着强大的外来挑战，再加上现实本身的许多复杂问题，使得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变得相当艰巨。传统是不可能割断的，外来的挑战也是无法躲避的，现实社会的问题更是迫使我们

去正视。我认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态度是：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切实的了解，深切地认识历史加给我们的沉重压力和传统的政治哲学的负面作用，将深厚的传统和外来的挑战，转化成实现现代化的力量之源，以便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多元开放的社会，而走向世界。

目 录

绪论 地理环境对中国政治究竟有没有影响？

I 铁犁与马鞭：地理环境和中国民族、民族战争

〔 17 〕 一 六大区域社会

1. 大江大河孕育的文明之邦
——内地农耕社会
2. 绿草黄沙的牧人之家
——蒙古高原牧业社会
3. 林海雪原沼泽的天地
——东北狩猎·农耕社会
4. 世界屋脊的神秘国度
——青藏高原牧业社会
5. 茫茫沙海中的绿岛
——天山以南农耕社会
6. 崇山峻岭分割的世界
——云贵高原农耕社会

〔 66 〕 二 民族战争分析

1. 时代之争

——民族战争的原因

2. 一浪高一浪，后来者居上

——民族战争的特点

3. “不教胡马渡阴山”

——民族战争的主要交兵地带

〔 83 〕 三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地理基础

Ⅱ 皇帝与土皇帝：

地理环境和统一、分裂；中央、地方

〔 91 〕 一 古代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地理基础

1. 千条江河归大海

——有利于统一的地理条件

2. 天高皇帝远

——不利于统一的地理条件

3. 真龙天子

——君主专制的历史必然性

〔 108 〕 二 历史上的南北对立

1. 南中国的崛起

——从南北对峙到自南而北

统一中国

2. 权力的转移

——从政治上唱配角到

唱主角

3. 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大运河对维持国家统一和

中央集权的作用

〔 123 〕 三 为何“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历史上经常出现割据的主要

区域分析

1. 山西高原
2. 关中地区
3. 四川盆地
4. 江南地区
5. 福建地区
6. 两广地区

【138】四 中央如何通过地方行政区划制度控制地方

Ⅲ 大中心与小中心：

地理环境和都城、都会

【148】一 古代都城的一般概况

【153】二 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王朝都城的变迁

【171】三 主要区域中心的变迁

结束语 未来的展望

后记

绪论

地理环境对中国 政治究竟有没有影响？

当刘备三顾隆中的时候，诸葛亮曾纵论天下大势和以后刘备立国的战略。他认为曹操称霸中原，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割据江东，画江自守，刘备无法与他们争锋，只有向荆州、益州发展。他说：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此其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隆中对策关于荆州为“用武之国”，益州“高祖因之以成帝

业”，讲的便是地理环境影响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讲的是作战进军路线，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历史上有关地理环境影响中国政治的表现不胜枚举，即使不计地理条件影响作战进军路线一类内容，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与此有关的问题：

为什么我国各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历史上它们的社会发展程度一般要比汉族地区低一些？

为什么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简称周边民族）经常与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简称中原王朝）发生武装冲突，常常进入汉族生活地区，建立区域性政权，甚至建立元朝、清朝等统一王朝？

中原王朝为什么要在边境上修筑长城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长城为什么多沿阴山、燕山等山脉而建？

既然周边民族和汉族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为什么中华民族大家庭没有分裂，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周边民族大规模入侵中原时，中原王朝常常要将首都南迁到长江流域，双方守秦岭——淮河为界。为什么秦岭——淮河会成为南北分界线？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割据政权，涌现许许多多的土皇帝？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又是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明以前历代实现统一都是自北方往南方用兵，明朝取代元朝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7年的北伐战争却是自南而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剧变？

人们常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为什么四川会出现这种状况？

为什么我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首都大多建在华北地区？为什么首都会先后从西安、洛阳、开封转移到南京和北京？人们根据什么选择这些地方作为首都？

成都、西安、北京向来是四川盆地、关中平原和河北平原北部的政治中心，它们凭什么成为区域政治中心？

诸如此类的“为什么”，足可以罗列出成百上千。这些问题，有的直接与地理环境有关，有的则和地理环境有间接的关系。

古代人在议论天下大事时，常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感叹。“地利”即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军事形胜。地理与趋势和时机（天时）、群体的团结和主观努力（人和）并列为争夺天下、巩固天下的三大要素。

但是，在过去的岁月中，由于某种原因，人们回避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这个话题，缄口不谈地理环境的作用，似乎人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浮在空中的尘埃，与地理环境不发生关系，更不用提研究地理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了。

客观存在的真理如同客观存在的事物一样，是谁都抹煞不了的。

地理环境是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既包括自然条件，也包括地理位置。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条件。笼统地提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发展，无疑是错误的，但如果抹煞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样也要犯错误。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曾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

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① 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所以诞生在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广大平原地区，原因是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宜于早期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机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必然也随之产生。不仅东半球如此，西半球同样如此。中美洲的河谷和南美洲西北部，草木茂盛、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当地印第安人的粮食自给有余，经济向多样化发展，城镇迅速增加，在白人踏上大陆以前的几个世纪，已拥有具有一切文明特征的较高的文化。相反，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却被迫过着游牧和狩猎生活，原因是他们居住地区要么是茂密的森林，要么是贫瘠的土地。

在人类脱离蒙昧阶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地理环境仍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方便的国度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就要比自然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的国度与地区快一些。固然，在各区域间存在着物资交换与人员来往，但这种交换来往的规模和水平也是依各区域的交通状况与地理位置为转移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势必要影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简要描述历史的地理基础。他说，世界上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第一种是蒙古高原、阿拉伯沙漠、南美洲奥列诺科河流域等高原地区，那里居民的财产不在于土地，而在于牛羊，过着游动的放牧生活，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有时会大群集合起来去袭击平原地区的居民，借以掠夺财富。第二种为大江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包括中国和四大文明的其它地区，土地肥沃，那里的居民经营农业，土地所有权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法律关系随之发展，农业生产四季有序的规律性造成墨守传统的习惯，伟大的帝国便建立在居民的惰性上。第三种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例如地中海地区，由于便于与外部世界接触，商业、航海业和手工业发达，居民富冒险性与创造精神，追求自由，文化水平较高，为世界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①

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增添了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现在，人类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造一定范围内的地理环境，使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加入了人的主观作用。同时，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日益被冲破，各地生活方式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依然存在，依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作用。即使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人类可以按最佳方案来安排自己的社会发展的时候，人类也不可能离开地理环境，只不过那时的地理环境带有更多的人为色彩，社会化更为严重罢了。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政治主要体现为国家制度和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内部、阶级之间、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等等），以及反映这些方面的意识形态。列宁在谈地理环境作用时，几乎一字不改地搬用普列汉诺夫的话，“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它社会关系的发展。”^②因此，地理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发生作用的，也就是说，是间接发生影响的。地理环境不同造成经济生活差

① 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

异，产生不同政治特色。地理环境也有直接影响政治的一面，如国界、国防区域、进军路线等等，但这些只是地理环境影响政治的相对不重要的部分。上述这种地理——经济——政治的影响机制，无疑是地理环境影响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本书一开始提出的地理环境影响政治的那些问题，大多也是通过地理——经济——政治影响机制表现出来的。

那么，我国的地理环境主要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今日和古代中国的领土疆域皆十分广阔，都是世界上主要大国之一。今日中国的土地面积达96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与欧洲相等，仅次于苏联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南起曾姆暗沙，北到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南北距离5500公里，纵跨49个纬度。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会合处，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西距离5200公里，横贯62个经度。远在汉唐时期，已奠定我国现代疆域的基本轮廓，而历史上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民族活动地域则更为广阔。广袤的领土为中国政治提供了巨大的地理舞台。有些历史学家曾将古代的西欧或地中海区域与中国比较，认为西欧与地中海区域国与国来往频繁，而中国对外来往较少。其实，如考虑到双方面积相去不远这种状况，西欧与地中海区域国与国的来往，差不多也就等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来往。

其次，它具有显著的多样性。

由于面积广大和地质地貌结构复杂，我国各类地貌都有，气候也十分复杂。有巍峨的群山、壮阔的高原、巨大的盆地、宽广的平原、冈峦起伏的丘陵、星罗棋布的岛屿。中尼边界的珠穆朗玛峰高达8 848米，为世界最高峰；而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却在海平面以下154米，也是世界著名的洼地之一。辽阔的领土、复杂的地质地貌结构，决定了中